

美国史研究通讯

The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 111 期)

主 编：王 旭

副 主 编：胡锦山 韩 宇

编 辑：韩 宇 高艳杰

责任编辑：高艳杰

校 对：李文硕 李 晶

出版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出版地：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7 日

本通讯的内容亦刊登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

www.ahrac.com

目 录

◆ 沉痛悼念任东来教授（二）

谢谢你，我的东来！——二十四载玫瑰梦	吴耘	(1)
最后的生日蛋糕：邹医生眼中的任东来	吴耘	(8)
24朵玫瑰的见证——献给我的爸爸妈妈	任琬洁	(9)
花园小记（英文诗·外一首）	任琬洁	(10)
“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忆爸爸做业主委员会主任的日子	任琬洁	(11)
怀念弟弟东来	任东波	(13)
平生情谊兼师友——追怀校友任东来教授	陈伟	(14)
他没有“曲学阿世”——追忆东来	胡成	(34)
永远是一个青年	张千帆	(39)
“天堂是座图书馆”——悼任东来教授	张千帆	(40)
痛悼任东来学长	徐国琦	(42)
大洋彼岸忆东来	翟强	(43)
A Dynamic, Lively, Inquisitive, Well-read Professor	Laurene Wu McClain	(44)
快乐的任东来	张小明	(46)
吊唁东来	卢林	(49)
与东来兄的最后一面：悼任东来教授（之一）	杨玉圣	(50)
学术生命之树常青：悼任东来教授（之二）	杨玉圣	(53)
写在东来离开我们一周之际	陈晓律	(55)
东来一直有一个梦	陈晓律	(56)
星星点点忆东来	陈仲丹	(56)
东来西去	孙江林	(58)
东来西去——怀念杰出的任东来教授	庞中英	(59)
任老师，一路走好	赵娟	(60)
回归“本真的自由”——东来老师头七祭	佚名	(61)
记与任东来先生的最后一面	闵凡祥	(62)
任东来教授与格林奈尔大学	冯进	(64)
我眼中的任东来	余宁平	(66)
好人任东来	尹朝安	(66)

那次我见到你——怀念东来	徐建清 朱网锁	(68)
如水纯，如松直——悼念恩师任东来教授	邱美荣	(69)
忆恩师任东来教授	孙 倩	(74)
忆任东来老师	罗珊珍	(77)
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任东来先生的为学与为师	胡晓进	(78)
失去的是我最珍重的良师益友——沉痛悼念恩师任东来	储昭根	(85)
忆吾师任东来教授	胡 美	(88)
学者的“纯粹”——写在与东来先生合著付梓之际	江振春	(94)
严肃为学敬业为师——纪念恩师任东来先生	张庆熠	(102)
沉痛悼念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	刘大伟	(106)
缅怀任东来教授	刘 畅	(108)
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 悼念任东来教授的文章		(109)
也忆任东来	廖笛衫	(112)
我永远尊重的学者和导师	林 杰	(113)
积极投身业主自治实践——追忆曲水文华苑小区首任业委会主任任东来教授	姚卫东等	(113)
忆任东来教授业委会工作二三事	余成耀	(117)
逝者任东来	田波澜	(118)
爱管芝麻事的大学者——任东来教授和他的人生追求	黄昉菴	(122)
著名学者任东来的生命之火（附吴耘老师评论）	伏自文	(127)

◆ 缅怀寄语

怀念小师妹张宏	孙群郎	(130)
---------	-----	-------

◆ 研究会工作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 OAH 合作信息两则		(132)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杨麦龙先生家属唁函		(132)

◆ 美国纪行

OAH 年会观感及访学经历	王睿恒	(133)
参加 2014 年 AHA 年会的经历	魏 涛	(135)

◆ 学术报道

2013 年“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夏季研讨班总结	欧阳贞诚	(141)
与现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OAH 主席艾伦·克劳特教授的短暂相处	王伟宏	(143)
北京大学美国史方向博士生出国交流情况统计	于留振	(145)

◆ 学术动态

-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索尼娅·米歇尔教授做客东北师大………欧阳贞诚 (146)
浙江大学美国研究所 2013 年下半年学术活动集锦 ………………金将将 钟丽雯 (146)
美国长岛大学夏亚峰教授在暨南大学讲学…………… (147)
美国奥本大学翟强教授先后在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讲学…………… (147)
CINFO-现代信息公司“美国社会与文化历史”专题数据库开通试用…………… (149)

◆ 会员动态

- 王晓德教授入选 2012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50)
杨令侠教授荣获“加拿大总督奖章”…………… (150)
李剑鸣和王晓德教授先后在武汉大学讲学…………… (151)
孟庆龙研究员参加印度新德里国际学术讨论会…………… (152)
高国荣博士成果入选 2013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52)
付成双、张勇安教授入选 2013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53)
厦门大学李莉获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153)
◆ 新书讯…………… (154)
◆ 重要通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通知…………… (156)
2014 年夏季美国史研讨班通知…………… (157)
◆ 编后语…………… (160)

沉痛悼念任东来教授（二）

谢谢你，我的东来！——二十四载玫瑰梦

吴 蕴

直到现在，我仍不能相信东来已经离我而去。二十四年前，于茫茫人海中万幸相遇的那个人，就从此失去了踪影？

在病床上，他右手握着琬洁，左手紧攥着我的手，我看着监测仪上他的血氧飘忽不定，脉搏骤然下跌，感觉到他的呼吸缓缓衰竭，温度渐渐消失。他要去了。霎时，大脑一片空白，心一阵麻木。

恍惚中，看到琬洁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穿衣，抱着他的小枕头嗅着他的气息，泪如泉涌，无声落下。情知这是真实的发生，这一刻终于来了！却又感觉这一切太不真实，像个幻境，我的耳边分分清楚地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激情昂扬的高谈阔论，听到他吃力却温柔地喊我，“Darling，水。”我清晰地感到自己在抚摸他的脸，那是高烧退后，阴凉湿润的感觉。中午，为了迎接客人，我为他刮了胡子，此时，脸上的皮肤干净光滑。

今年3月上旬，医生通知我做好最坏的准备，女儿琬洁也中断学业立刻回国，可我还是不能把“东来”和“离开”联系在一起。十个月以来，我不断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残酷的现实，可是每当心情跌至深渊，总有一个希望把我从谷底拉起，“还有一种治疗方案，可能对他有效”。医生的话，又一次支撑起我打软的双腿，点燃我的希望，我擦干眼泪，走进病房，抓起东来日渐消瘦的双手，把力量和信心传递给他。

在病中，东来坚强乐观，也还是那样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今年春节前，我髌骨骨折，卧床在家，东来婉言谢绝中美中心安排员工夜晚陪护。我年迈的父母顶着寒风为他送饭，他心疼不已，坚持要吃医院的饭菜。我瘦弱的小妹每个周末往返于镇江南京，为他带来精心烹调的营养羹汤。为了不负小妹一片心意，他努力克服胃部的不适，喝下羹汤，品味香浓的亲情。他担心躺在家中的我，入睡前不忘发来晚安短信。

2月22日，我们结婚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他托朋友送来二十四朵玫瑰。当晚他发来短信：“明年这个时候我送你25朵玫瑰。宝贝，做个玫瑰梦吧”。

一、法语课上的“邻桌”

1988年，我和东来同时就读南开大学，他在历史系读博士，即将毕业，我在旅游系读硕士，二年级。机缘巧合，我们进了同一个法语班。

东来语言模仿能力欠佳，偏偏法语老师喜欢让大家朗读课文。基础不好的同学通常挤在教室的后排，只有东来老老实实地坐在前排，总是最先被叫到。他抓耳挠腮一番后，用右手食指轻蹭着下唇，开始了独特的朗读，他完全采用了英语的发音规则。后来，他告诉我，每次读法语，都是在“suffering”（遭罪）。而我有一定的法语基础，朗读是我的强项。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概是（由于）她法语非常好，居然对她颇有好感。”

八十年代末，我所在的旅游系接收了一些退役的运动员。我是他们的英语老师，经常在课后给他们开小灶，所以身边常围着一帮大高个。一次，我们去参加博士生会组织的舞会。进屋后不久，就发现一个男生埋头扫地，一个女博士对他喊道，“……，你干嘛？搞得到处都是灰”。多年后，东来解释，他看我进来，有些紧张，扫地是想掩饰一下激动。

舞会快结束的时候，扫地男生请我跳舞。他明知故问，问我是不是某某法语班的，我一怔，原来他就是那个念英文法语的男生。后来谈起，东来不服气，说我当时是装的，他那么优秀，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呢？

那年五一节期间，我到南京搜集资料，他欣然为我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中美文化中心图书馆。当时的副馆长邵金丽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把东来大肆赞扬一番。返回天津后，我继续上法语课，东来的法语依旧磕磕巴巴，可是我们的座位越来越近。

就这样，我们相互走进了对方的人生。

二、“你真有福气，一儿一女”

在学生面前，东来是受人尊敬的师长；在同仁面前，他是严谨的学者；在长辈面前，他是谦和的后生；在邻居眼里，他是平易近人的任主任；在女儿琬洁身边，他更像是一个大哥哥。

东来很早就意识到独生子女教育中的难点：没有竞争对象。为了给琬洁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他屈尊纡贵，把自己摆到和她一样的地位。在牺牲自己的同时，树立起了我的权威。对于爸爸的教授身份，年幼的琬洁并不清楚，只知道每年夏季，爸爸都要忙于学生的“论文大便（答辩）”。长大以后，琬洁才逐渐理解爸爸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琬洁小时候，家中挂着一张表，有每天的各种日程安排，顶端并排写着“任东来，任琬洁”。根据两人的表现，我在每一项目程旁贴上小红旗。不久，琬洁的红旗遥遥领先。后来意识到，把对手甩得太远反而没有了动力，我就暗中对东来作适当的政策性倾斜。而东来过于进入角色，有时真把自己定位成了大哥哥。比如，两人竟然会结成同盟，共商对付妈妈的良策，记得其中有一条是，“对待妈妈的批评，要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有件囧事，东来一直羞于启齿。1999年秋至2000年春，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作访问学者，琬洁与我赴美探视。一次，全家去购物，琬洁为了一枚金属戒指和东来发

生争执。于是，两人就像孩子般对嘴，最终演变成互相踢腿。东来想得到身旁其他顾客的理解，不料遭到一位老太太严辞训斥。东来没有听懂，诧异地望着她，我无地自容，赶紧拉着父女俩离开。有一段时间，老太太的话成了琬洁对付大哥哥的法宝。

琬洁的成长过程中，我在幕后，东来在台前。琬洁初中就读于树人中学，东来是家长委员会成员；高中就读于南师附中，东来参加了多次家长会。琬洁的同学和老师这样形容他：“那个看上去像任琬洁哥哥的人是她的爸爸。”十多年前，我们全家去爬紫金山，东来和琬洁蹦蹦跳跳，走在前面，一位长者对我感叹道：“你真有福气，一儿一女”。

三、金银花老太太的护花使者

东来真诚待人，心中永远装着朋友，眼中永远看到别人的闪光点，鸿儒和白丁均能成为他的朋友，就像三十五年的老朋友陈伟所说，“东来确实有这种本事，几乎能与任何年龄、背景、身份、专业的人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

我们原先居住的小区位于风景旖旎的秦淮河畔，热心的业主都很关注小区内的居住环境。众多业主中，有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格外引人注目，她特别钟情金银花，在小区的铁围栏边、步行长廊边，种植了多株金银花。

有一次，长廊旁的紫藤花枝干被人砍断。个别业主就推测是老太太担心紫藤影响金银花的生长，故意将其砍断。老太太备受委屈，多次找担任业委会主任的东来说明情况。老太太是个话篓子，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东来这个急性子总是耐心地听她掺杂着吴语方言的诉说，还不时安慰她，让她放心，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

风言风语刚刚平息，门房师傅又向东来抱怨，说老太太从菜市场讨来大量的鱼肠和鱼杂，埋在金银花根下当肥料。入夜，几只野猫寻味而来，从土中刨出鱼肠，散落一地，引来苍蝇无数。东来再次出马，了解情况，原来，老太太年事已高，腰椎不好，不能长时间弯腰挖土，肥料埋得过浅了。东来便发动琬洁和同学帮她施肥，把鱼杂埋入更深的泥土层。冬去春来，在老太太的精心护理下，围栏边的金银花长成大大的伞状，很好地维护了小区的私密性。

东来和老太太成了朋友，无论是在小区还是在菜场，她只要见到东来就有说不完的话。她把自己喜欢的《李开复自传》推荐给我和琬洁阅读，还赠与我们她的先生——一位书法家写的字。如今，她送给我们的金银花苗也已长大，在我们的小院中绽放。

四、豆荚中的两颗豌豆

东来的亲和力跨越了国界，他的朋友遍天下。他生病后，国内的朋友关心他，国外的朋友也挂念着他。3月18号，美国Drake大学的David Skidmore来邮件，告知8月份要来南京，东来当即回信给予答复。4月22日，David再次来信告知具体行程，东来已无力阅读邮件，

我只能将东来生病的消息告诉他。David 在回信中写道：

“天啦，我坐在这里哑口无言。我惊讶万分，痛心疾首。Charlene 和我与你，东来和琬洁，以及所有遭此悲剧的家庭成员同在。你和琬洁都很坚强，但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我不了解东来的具体情形。但是，如果可能，请向东来转达我最深的感情。我一直把东来当成兄弟（我只有姐妹）。我们在宁期间，东来热情好客，让我们全家感动至深。尽管我们偶尔见面，但是多年的友谊对我意义非凡。东来做的每件事，无不体现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他以你和琬洁为自豪，对家庭无比忠诚，令我钦佩。我始终认为，尽管我和东来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有诸多相似，包括我们的世界观。

希望你把我的感受告诉东来。我还是希望 8 月份能见到他。不管怎样，我都想看望你和琬洁。”

David 1995-1996 年任教于中美文化中心，在很多方面和东来相似。两人都爱讲话，都特别宝贝女儿，两位太太都安静少语。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两位先生都不显老，而两位太太身材走样，老态尽显。有一次，David 沮丧地对我说，“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讲的话太多了。”和东来在一起，David 没有丝毫压力，他们可以争先恐后，畅所欲言，快乐得像孩子。Charlene 用一个成语形容他们，“two peas in the same pod”（豆荚中的两颗豌豆）。

五、严师出孝徒

东来是富有的，除了钟爱的学术，还有一大批热爱他的中外学生。在我的印象中，东来坚持原则，对学生相当严格，对国际学生也从不搞特殊待遇，课业上一视同仁，给分公平公正。

对于自己的研究生，他刻意保持距离，只在学业上给予最细致的辅导。他说，有些学生来自农村，如果打听他们的家庭背景，会在无形中造成他们的自卑。如果关系过于密切，走得太近，对学生的评判会失去公正。

2005 年初，东来动了一次痔疮手术，学生小储得知消息，订了鲜花前往家中探望。到了楼下，东来就是不告诉房号，两人僵持达一小时之久。小储虽是执着之人，但终究拗不过他，只得离去。

别看东来平时满脸笑容，但如果学生文章写得不好，经过修改仍不达要求，他可是翻脸不认人。在他的办公室，我多次听到他在电话中训斥学生，有时甚至是当着我的面，弄得我们都很尴尬。

他的第二个硕士生邱美荣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那时没有电脑，论文都用方格稿纸抄写。有一次，小邱交去的论文出现了错别字，段落划分也不清楚。我碰巧撞见他对小邱发火，“老

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小邱走后，我问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这位不讲情面，有时甚至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的先生，却拥有着人间最真纯的隆情厚谊。东来去世后，小邱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回忆：“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则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

东来病重期间，小邱把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交给朋友照管，从上海赶往南京替换琬洁，在军区总院像女儿一般陪护东来三天，令东来感动得落泪。

除了小邱，其他弟子也不顾我的劝阻，从四面八方赶来南京，为老师加油。开门弟子振江两次从广州和北京飞抵南京，雪中送炭。王琛从河南带来补血的大枣。庆熠夫妇从杭州送来安慰。裕海夫妇送来精神鼓励，治病良方。雪峰从花店订来鲜花，装点单调的病房。颜廷探望完老师，回到徐州，随时待命。即将答辩的景文，放下论文，从湘西赶往南京。东兴从河南带来地道的焦作山药。家有老小、工作繁忙的振春，为他擦洗身体。远在浙江的胡美，把嗷嗷待哺的宝宝交给婆婆，前来探视。上海的晓天，来到病房，热心提供帮助。大振不时买来新鲜的蔬果，陪伴在老师身边。杭州的小储来到老师的床头，向他汇报自己的成绩。李丹从扬州赶来，把新婚的丈夫介绍给老师。老师最不放心的娟娟丫头，跑前跑后，承担所有的杂事。北京的晓进，全程参与治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陪我短信聊天到凌晨。

去年，东来指导了三名国际学生的论文，为了不影响他们毕业，他在病中认真修改论文，使他们得以顺利毕业。得知东来离开，艾尚恩同学悲痛万分，他发来唁函：“总而言之，任东来教授对于我在中美中心的经历赋予了重大意义。没有上他的课，可以说我在中心的时光很愉快。有幸上了他的课，我在中心的时光难以忘怀。我和同学们仍能感受他的乐观、智慧以及对一切事物的激情。他同意指导我的论文，我十分荣耀。尽管他的患病令我们交流减少，电邮代替了办公室面对面的接触，但他的真知灼见，珍贵评论，浓厚的热诚把我的论文打造成一份得意之作”。

六、家中的阿 Q 先生

东来身上有种魔力，那就是屏蔽烦恼，享受人和事物最美好的一面。丢了钱，他假设钱被捐掉了；有人说他的不是，他说没有亲耳听到，没有证据；家中物品损坏，他说东西总是要坏；开车不当心误闯了红灯，自责之余，他说违章罚款总是难免；物价上涨，他说别担心，工资也会跟着涨。

1989-1999 年，我们居住在云南路北阴阳营 8 号南大宿舍，我们的两间房仅有二十三、

四平方，和邻居共用走廊，且非常破旧。那段时间，琬洁霸占了办公桌，东来挤在折叠饭桌上看书，我则把备课资料摊在床上。他说，比起筒子楼的青年教师，我们幸运多了。记忆最深的是，每当盛夏，酷暑难当，东来把矿泉水瓶放入冰箱，睡觉时放在脚下降温。后来，同时代的博士陆续特批分到宽敞的房子。他进一步发挥了阿 Q 精神，说自己的单位好，有独立的办公室，有国内最好的图书馆。

东来体质较弱，稍一疲劳，就会诱发鼻炎和咽炎，引起发烧。我和琬洁经常提醒他，要多穿衣服，外出不要过于兴奋，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却争辩说，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东来英年早逝，有的学界朋友自然地联想到国内学者面对的压力：课题申报和评审、房子、车子和票子。我完全理解这一现象，可是，东来并未这么认为。他的心态很好，能上就上；不行，下次再来。他不去刻意争取什么，名利好像都是别人的事。

东来的自我安慰、他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化解了生活中的种种烦扰，就连得此重病，也能自我解嘲。去年夏天，琬洁赴美前，对我们说：“我这辈子活得很有尊严，如果疾病不治，我也能和李慎之、丁先生、杨先生去天堂聊聊天了”。

七、向死而生

去年 7 月初，东来确诊患了淋巴瘤。他反复强调癌症是种慢性病，以此来安慰亲友和学生。7 月 17 日，东来住进鼓楼医院，我拎着片子，心情沉重，满面愁容。琬洁陪着爸爸，不似往日那般与他嬉戏打闹。东来依旧像个大男孩，脸上挂着招牌式的笑容，声音洪亮，大步流星地跟着医生办手续。医生很纳闷，不知道谁是病人，东来为此颇为得意，逢人就说，医生都看不出我是病人。

今年 1 月，病情恶化，病灶发生远程侵犯，腹股沟迅速长出两个肿块，医生决定进行手术切除。术后第二天，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看到我神秘地进出病房，却一点也不猜测，反而若无其事地对朋友说，只是一个炎症，开掉就好了。

随着病情的加重，东来的乐观逐渐演变成一种坚强与坦然。3 月下旬，最后一文化疗药物几乎将他击垮，白细胞一度跌至两百，严重的 IV 度骨髓抑制。他对我说，虽然有恐惧，但希望有向死而生的勇气。

病床上，他望着天花板，除了生死，更多地思考他钟爱的学术。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弟子：“振春，我想好了一个题目，我们的那本书就叫《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

4 月 5 日，最后一次回家，东来打开电脑，输入了两个关键词“南京，树葬”。检索一番后，有些失望，摇摇头，说：“看来，南京的树葬还不规范。”我的心一阵绞痛，只能别过头，忍住泪水。他轻轻撩开我的头发，“Darling，长了这么多白头发。”接着，用手指抚摸着我松

弛的眼袋，温柔地说，“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完美的。”没有多余的话，他用他的方法向我告别。

4月22日，他最后一次住进鼓楼医院，经检查，身体已经无法经受任何放化疗。26日晚，振春来到医院，东来坚持坐在椅子上，与他商谈两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他吩咐振春购买150本著作，放在追悼会现场，供来宾领取。振春原准备留在医院，和琬洁一起，陪护老师一晚，但在我们的催促下，又看到老师精神不错，便放心地离开了。

4月28日中午，他挣扎着最后一次坐在椅子上，与前来查房的邹医生聊起孩子的教育。谈到美国本科教育，他兴致勃勃，临了，还诚恳地叮嘱一句，“我太太对美国大学也很了解，我不在了，你有问题可以咨询她。”我不知道多少临终病人能有这样的镇定与平和，那一刻，病房里只有我们一家，窗台上一支黄色月季花静静地绽放着。那份温馨，就像我们仨平时在家，围着饭桌，喝茶聊天。

4月28日，弟子晓进前一日从北京昌平匆匆赶到南京，东来准备把两本半成品著作交由他来完成。是日晚，晓进把东来的电脑带到病房，这时他已无力坐起，只能躺在床上敲打键盘。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但讲话已相当吃力，主要意思是让晓进以自己的标准组织完成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十位最有影响力的大法官》。交谈间，发现另外一部《美国史研究入门》找不到了，一着急，他竟然左手托着电脑，又搜索了两分钟。经我提醒，有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这才作罢。这是他最后一次讨论他钟爱的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学术。

东来先我而去了。

明年的结婚纪念日，再也无法送我二十五朵玫瑰了；但与东来执手相伴的二十四年，却如夏花一样绚丽、灿烂、多彩。

东来透明如水晶，纯真如孩童，善良如天使，乐观如朝阳，热情如火焰，执着如磐石。

今生得与他结缘，该是何等的幸运，他给予我的，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梦幻一般的美丽岁月。

谢谢你，我的东来！

2013年5月15日

于紫气家中

最后的生日蛋糕：邹医生眼中的任东来

吴 蕉

5月2日上午，东来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娟娟打来电话，她和师兄景文正准备给任老师定一个生日蛋糕，不知道老师喜欢哪种口味，想问问我的意见。我告诉她，我知道老师的口味，蛋糕由我来定，让他们不用忙了！接电话时，我正陪护在东来床边，他在一旁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便吃力地说，“把蛋糕给邹医生和小李医生送过去！”邹医生和李医生是他的主治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们交流非常融洽，我们全家十分感谢两位医生的悉心救治。

东来最终还是没能吃上52岁的生日蛋糕，但他乐观、坚强、嗜书如命、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却深深地感染了邹医生。5月17日中午，当我动身陪女儿琬洁赴美参加毕业典礼之际，邹医生给我发来信息：“吴老师，您好！我是鼓楼医院邹医生，这么久才和您联系，主要是怕我的短信让您伤感！！虽然仅仅是数天的接触，但你们一家三口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敬佩：女儿是那么的懂事、优秀，任老师是那么的儒雅、淡定，您又是那么的温柔、娴淑！！任老师虽然走了，但任老师为人处事的那种精神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会激励并影响一大群人，他其实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多很多!!! 那天中午的谈话让我倍感温馨、亲切，任老师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 我工作18年来，从没有碰到这样的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表现得如此淡定，似乎一切都早有准备!!! 自己已危在旦夕了，还执意让女儿去上海签证，一心想着让女儿琬洁去美参加毕业典礼!!! 任老师总是替别人考虑很多很多……!!! 吴老师，您现在的心情我能深切感受!! 我相信您一定会很坚强的!!! 任老师还会远远地看着您、爱着您、护佑着您和琬洁的!! 虽然我们从事的专业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常联系（请保存我的手机）!! 预祝琬洁18日的毕业典礼一切顺利!!! 祝福你们!!! 邹征云”。

这就是东来，不管境遇有多糟糕，心中总是装着别人，对伸出援手的亲朋好友永远心存感恩。也因此，在短暂快乐的一生中，赢得挚友无数，真情无边。

24朵玫瑰的见证——献给我的爸爸妈妈

任琬洁

99朵玫瑰象征天长地久，1000朵玫瑰象征至死不渝，1314多玫瑰代表一生一世，而我却见证了24朵玫瑰的生死恋。2013年2月22日，一位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用他瘦骨嶙峋的手，用他残喘的气息，托朋友向花店定制了24朵玫瑰，送给骨折在床的妻子。

第1朵庆幸她24年前牵起他的手
第2朵炫耀她的冰雪聪明
第3朵眷恋她的温柔贤惠
第4朵嘉奖她可爱的女儿
第5朵感动她义无反顾的牺牲
第6朵难忘她的万般包容
第7朵不舍她的辛勤劳累
第8朵哭泣她的心酸眼泪
第9朵依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第10朵无悔她的不离不弃
第11朵，她陪伴了他病房里几百个漫漫长夜
第12朵，她绞尽脑汁研究了几十种营养食谱
第13朵，她在沸水中忍着剧痛为他擦洗身体
第14朵，她不分昼夜帮他洗衣服并清理污物
第15朵，她奔波南京北京分担他放疗的苦痛
第16朵，她吞下泪水隐瞒他病情鼓励他坚强
第17朵，她为了迎接他回家休养而不幸摔伤
第18朵，她年迈的岳父母跌跌爬爬为他送汤
第19朵，她娘家的妹妹为他放下夫儿和休假
第20朵，她娘家的弟弟深夜驱车赶来安慰他
第21朵，她安排五湖四海的学生守候在病榻
第22朵，她忍着骶骨剧痛放心不下病中的他
第23朵，她紧握他的双手传递力量击退恐慌
第24朵，他安详地微笑着在她怀里到了天堂

这是他最后一次送她一捧红玫瑰花
他是我的爸爸，而她，是我的妈妈。

当化疗扯光了他的头发，她还爱他；
当老人斑爬上她的脸庞，他还爱她。
当他眼白充血面色蜡黄，她还爱他；
当银白吞噬了黑色秀发，他还爱她。
当呕吐物脏了她的衣裳，她还爱他；
当蜚语留言玷污攻击她，他还爱她。

最终，爸爸残喘的气息渐渐消失，微弱的脉搏缓缓停止，瘦弱的身体失去了温度，却紧握着我和妈妈的手，用眼神表述了 24 朵玫瑰的故事。

花园小记（英文诗·外一首）

任琬洁

花园小记

Japanese ivies crept, Chinese roses leaped,
You sow the seeds in last spring mist.
The greenest tips, the freshest leaves,
You cared the pots paying careful heed. Yet, when honeysuckles bloom and chameleon roses unfold,
You leave the buds in the chilly winds,
You miss the blossoms of future springs,
Or you are watching me from another world.

思念爸爸

Staring at your photo, I see you, warm smile that bares six teeth;
Playing your memos, I hear you, weak voice that gives me strength;
Handling your pillow, I smell you, unpleasant odor that I'm afraid to loose;
Reaching out my arms, I can't feel you, desolation devours me deep beneath.

I miss your sunshine that brightened my path,
I miss your brotherhood that gratefully I hath,
I miss your naïveté that purified my soul,
I miss your fatherhood that helped me grow.

“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

——忆爸爸做业主委员会主任的日子

任琬洁

那是一阵再也不会响起的铃声，却是一段刻骨铭心、永不抹灭的记忆。

2006年底，我们家搬进了曲水文华苑。虽然小区坐落在风景优美的秦淮河畔，可惜，管理不尽如人意。李家擅自把大门向外拓宽一米，遮挡了公共窗户；张家把电动车推进了电梯，拥挤了楼层走道；王家随意泊车，堵住了小区消防通道；小区广场，大妈舞蹈队夜夜笙歌，扰乱了高考学子的静心复习；化粪池和下水道得不到及时清理，散发出阵阵恶臭。小区的大多数居民，对这些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发发牢骚，抱怨几句，更有甚者，干脆同流合污，占占别人的便宜。

总之，大家都自扫门前雪，我和妈妈也维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可爸爸就不同了，在他眼里，“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不是我们家，而是全小区的业主。每逢他向我大肆宣扬这种“大我精神”时，我就调侃他是小区的活雷锋，无论怎样，也要颁给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奖章。每当我故作激昂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时，他则无奈地摇摇头，撇开我的嘲讽，心里仍旧盘算着，如何改善我们小区的面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经过多方打听，查找资料，走访管理良好的小区，最终决定要推进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帮志同道合、热心公益的业主，与他不谋而合。这些充满热血和爱心的叔叔、阿姨，终于组织起了一支“起义队伍”。其目的不是揭竿而起，而是通过民主程序，自我组织和管理，走一条温和改良的道路。

业委会的成立过程，非常民主。爸爸效仿西方的民主程序，拟定了业委会章程，举行了差额选举，并带领“起义军”亲自上门派发选票。统计“大选”票数后，一位女战友选票领先，可是，她考虑到自己念初二的孩子，觉得应该把更多时间放在照顾家庭上，婉拒了这项光荣的使命。选票第二的爸爸，便兴冲冲地接下了业委会主任的担子。这是他第一次，也是

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爸爸却是明镜高悬，薪火不灭。在任主任的管理下，小区的第一大进步，就是解决了私家车停放的问题。我们小区总共有5栋18层高的住宅楼，地面停车位却少得可怜，地下车位只售不租。这种求大于供的局面，扰乱了小区秩序，也导致了业主之间的种种矛盾。学者出身的爸爸考虑全面，从两个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扩大地面停车场，增加可供出租的地下车位；其次，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每个人的车位。

在第一个方面，爸爸和业委会成员仔细研究了楼盘开发商提供的小区规划图，巧妙、合法地收回了貌似公共用地的小区广场，扩大了路面停车场的面积。对于地下车位，他们通过查找各种文件，迫使开发商再拿出12个地下车位出租给业主。

在抽签决定车位的问题上，爸爸发挥了他的学究气，保证了抓阄程序的严谨和公平。整个过程包括两个抽签环节：第一轮，大家只是抽一个顺序；第二轮，才是抽车位号。我们家派出的抽签代表就是任主任。爸爸第一次手气很好，抽到了第一名，匆匆忙忙地回家向妈妈和我“汇报”，而且还特地调侃了一句：“好人就是有好报。”爸爸热心公益，故自称“好人”。遗憾的是，第二轮抽签，也就是抽车位的时候，爸爸没有抽到。当然，他也不沮丧，把这次“好人没好报”当作案例，向广大小区居民证明：车位面前，人人平等。后来，好像是一位业主把车位主动让给了爸爸。这样民主推选、廉政勤政的清官，爸爸当了四年半。

期间，“业委会”一词，让我的耳朵生了茧子，让妈妈一听就头昏脑胀。起初，爸爸在家里处理业委会事务，后来在我和妈妈的强烈抗议下，他只好将战线转移到办公室。即便这样，他在家里也是坐立不安，一个门铃，一通电话，他就立马溜出家门。渐渐地，由于大家疏于对业委会主任职责的明确认识，越来越多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找上爸爸，如赵先生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门外了，李太太晚上回小区没处泊车，老太太种在院子里的金银花被人剪了，等等。

对于诸如此类的琐事，爸爸总是拿出一百分的热情、一百分的专注去解决，甚至忽略了我紧张的美国大学申请。虽说他每次出门处理公事之前，都会跟我和妈妈打个报告，但就算我们不同意，他也是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开溜。回家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睡，他就会“darling, honey”亲热地喊着，讨好我们。很快，我和妈妈都发现了规律，如果爸爸哪天主动削水果，洗碗，那肯定就代表他一会儿要去业委会服务了。

看到他这样一次次“说话不算话”，不顾小家顾小区，我决定“整整”他。在那个苹果还没有成为爱疯、诺基亚仍在当道的时代，爸爸用的是我淘汰的儿童机——三星S3030。我深知爸爸在手机方面属“菜鸟”级别，除了最基本的接或打电话，信息都经常发空的。于是，我趁他不在，悄悄给他手机录制了一段别致的铃声：“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现在想想，这句话根本就有语病，什么是“业委会来了”呢？不过，由于当时我对业委会的事情漠不关

心，不甚理解，自认为很聪明。爸爸第一次听到这个铃声是在家里。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一脸诧异和尴尬的表情。不过，我的铃声很准，那通电话恰巧就是业委会成员打来的，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实，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以后每一次业委会开会，我都会在一两个小时后，或者是我认为他该回家的时候，给爸爸打电话。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他的会议，但我可以想象他听到我阴阳怪气的铃声时的那种手足无措。因为他当时还不会把手机静音，只好听任它响着，或者接听我的电话，挨一顿训。每到此时，我都会因为自己小小的恶作剧而开心不已，品尝着自己管理、修理大官任主任而产生的骄傲滋味。

不幸的是，我的管制铃声来得太晚了，爸爸身体已经走下坡路了。爸爸曾经是家里的噜王、天睡星，永远睡得最早，起得最晚。可是，自从接手了业委会，爸爸居然需要靠安眠药让自己入睡。起初，他还瞒着我和妈妈，怕我们担心，也怕我们批评，毕竟他非常清楚，我们反对他主持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听见客厅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因为没有见着灯亮，我起初怀疑是小偷。我举着板凳当自卫武器，一步一个小心，朝客厅逼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生怕透露了行迹。一开灯，爸爸吓得转了个身，手上的安眠药也掉落在地，当场人赃俱获。他当时极力推脱，声称失眠症和业委会无关。但是，任主任那些小小谎言，岂能逃过妈妈和我的法眼，只好硬着头皮坐着，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

现如今，爸爸再也不需要聆听我和妈妈的“再教育”了。我们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铃声：“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

怀念弟弟东来

任东波

我是任东来的哥哥，在吉林农业大学工作。从生理年龄上讲，我是哥，比东来大2岁，但从心里上，东来却是我的哥哥；孩提时代我就经常听弟弟的话，即便是近几年也是如此。东来少年离家，与外婆一起生活，养就了外婆所拥有的一切美德：勤俭节约，生活简朴，敝帚自珍，反对浪费；他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充满阳光；他乐于助人，为人诚恳，虚怀若谷，善待一切……

东来的人生几乎是在校园度过。在大学时代，为了学业，他很少回家；工作以后，为了事业，即使春节，也很少回家。年过八旬的父母、我的妻儿都盼望弟弟一家人经常能回家，我每次想说但都不敢说，怕打扰弟弟的事业与工作。即便如此，我们彼此总是牵挂。

东来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研究者。他很早就提出构建中国学术规范，宣扬高尚的学术道德。东来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博闻强记，知识渊博，性格开朗，快乐得像个大男孩，亲和力非常强。我也在高校工作。但无论从研究还是教学，同东来弟弟相比，还有很多差距，弟弟是我的楷模。

弟弟一辈子爱书。书就是他的命。他曾说：读书人有三种境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临走前两天还在和看望他的客人在讨论出书的事。我慢慢理解了这三个字的含义，正如报纸所言，他是“用命搏真知”，对我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

弟弟曾说，天堂是座图书馆。那里有的都是书，不再有疾病带来的痛苦。弟弟走了，哥哥很孤独。爸爸和妈妈更孤独。愿他一路走好。我会竭尽全力照顾好咱爸咱妈的！让他放心地遨游在书的天堂，全家人会等着他的归来……

在东来生病期间，亲朋好友通过不同方式对他表示了问候和安慰，帮助他完成了一些事情；在他病逝后，很多朋友发了唁电，写了纪念文章，有的千里迢迢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南京大学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自始至终都给予了很大帮助。作为东来的哥哥，我在此一并感谢大家。

5月4日22时

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

平生情谊兼师友

——追怀校友任东来教授

陈伟

一、大学初识长春

我和任东来是东北师大（长春）1978级校友，他在历史系，我在政治系。好像从一开始，大家都叫他“东来”，把那个“任”给省略了。

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入学两周后因比赛乒乓球相识。那时东来还是个17岁的大男孩，阳光明媚，风华正茂，虽然貌似文弱书生，但球风却相当凶悍，把杀得我难以招架，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35年的友谊。彼时情景，恍如昨日。

恕小子不敬，当年母校政治系的师资水准，实属平平。相比之下，历史系则是名师云集，尤其在世界史领域，丁则民（美国史）、林志纯（世界上古史）、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姜德昌（世界近现代史）、夏景才（苏联史）等教授均为独步一时、闻名遐迩的大腕。我的

大学生涯，吊儿浪当，自由散漫，不务正业，自大一之后，将近一半时光用于在历史系旁听。至于本系的课程，基本上靠照抄同学笔记应付。

我去历史系旁听，经常碰到东来，而且两个系的男生寝室在同一层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前几年我们交往不多。77级、78级的学生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经历复杂，相比之下，东来只是个小高中生，年龄在全系120人中倒数第一。论学识和见识，他相形见绌，甘拜下风。我比东来痴长两岁，行伍军旅出身，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应届高中生同窗们都应尊称我：“解放军叔叔”才对。

不过，东来也有优势，他出身书香门第，英语基础很好，经常“偷听敌台”（美国之音英文广播）。当年在同学们眼中，东来是个聪明过人、调皮可爱的小兄弟，偶尔会悄悄地“广播”一些在当时听来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域外奇闻，比如，如今美国最流行的是“婚前同居”和“试婚”。把那些古董冬烘的老夫子震惊得目瞪口呆，让那些已届而立之年、从未谈过恋爱的大龄光棍男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1982年大四时准备考研究生。他学英语，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美国外交，导师杨生茂（南开教授）。我学俄语，报考了社科院苏联东欧所的苏联外交，导师徐葵（苏东所所长）、邢书纲（外交室主任）。当年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是苏美争霸全球战略，故我们的交往和切磋开始密切起来。我们当时考研的最大困难是几乎没有复习参考书，基本上靠《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国际版准备专业课考试。新华社记者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美国学者撰写的《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成为我们在图书馆反复借阅、经常讨论的书籍。

初试上榜后，我和东来都赴京参加复试。结果，东来金榜题名，我却马失前蹄。主要原因是公共课政治一门没考及格（51分），远远低于历史系出身的东来，奇耻大辱呀，照抄笔记实在要不得。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地处汉口的总参通信兵指挥学院，东来赴京读研。我们开始书信往来，一直持续了30余年。

二、去章府讨口茶喝

当年美国所考生众多，竞争激烈，东来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得益于名师指导，丁则民先生是当时国内大学美国史专业三位有留美经历的教授之一，再加上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勤奋攻读；另一方面，他得益于当时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大环境。北大历史系高材生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兼驻美大使）与美国所长李慎之是世交，可是，因一道论述题跑了题，照样名落孙山。第二年，美国所不招生了，章百家转而考上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新研究员的研究生，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外交史专家，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984年初，我再次报考苏东所，5月份再次赴京复试。考试结束后，我去拜访东来。当

时研究生院尚无校舍，81级、82级临时住在海淀区的十一学校（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赶到时，已是中午一点，食堂已经收摊，有饭没菜。东来热情周到，当即去农贸市场割来半斤瘦肉，买了一把芹菜，两瓶燕京啤酒，借了个煤油炉，笨手笨脚地给我做了个芹菜炒肉丝，前后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

大概是真饿了，这顿“免费午餐”很可能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香的几次饭食之一，馋涎飞流直下三千尺。当时东来还是个穷学生，平时节衣缩食，自奉甚俭，略有闲钱，都花在了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那时，四册一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董乐山先生主持翻译的名著，九成新的旧书要价仅人民币一元二角左右。他做东请我吃顿便饭，实在是破费了。

为了感谢东来的款待，我考研成功后，在前门全聚德请客，吃烤鸭。他温文尔雅，边吃边聊，烤鸭吃得不多，而且不胜酒力。我可真没客气，连吃带喝，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就跟几辈子没下过馆子一样，大半个烤鸭尽入吾腹中。饭后，两人遛达到了天安门广场，感觉口渴。东来提议说：“咱们去章百家那儿讨口茶喝吧。”事先没打电话，没有预约，冒冒失失地就去了。

记忆中，章府好像是在天安门附近的南河沿一带，四合院，大宅门。那天应门的是章文晋夫人、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阿姨，和颜悦色，风度极佳。听说是儿子的同学，她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堂屋，意外碰到章文晋与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等正在打桥牌。看到小辈进屋，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叫牌。我们也巴不得不跟这些高官大员打招呼，赶紧避开。

章百家见到东来，没感到意外，也没什么客套，俩人前几天还在学校见过面，年龄也相差了13岁，但仍然聊得热情似火，难分难舍，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东来确实有这种本事，几乎能与任何年龄、背景、身份、专业的人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约一小时后，东来和我告辞出门，突然想起来，忘记讨口茶喝了。

三、“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我们84级研究生入学后，暂住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距十一学校，骑车约10分钟。有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往东来那边溜达一趟。他当时与苏东所82级苏联经济专业杜海燕、林中仁等学兄同在一个寝室。去得次数多了，偶尔会碰上杨生茂先生从天津前来看望和指导徒弟的场面。

杨生茂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但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外貌和穿着与乡下老农并无二致，土得掉渣儿。他们师徒两人的会面，时常演变为东来的“一言堂”。这个孙子辈的徒弟，口

才极佳，从国际形势到外交政策，从读书心得到治学体会，从最近淘到的旧书到国内外学术界最新动态，乖乖，侃了个天花乱坠，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杨先生和颜悦色，和蔼可亲，洗耳恭听，除了偶尔点点头，基本上一言不发。记得他们寝室当年流传过一个笑话：“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当然，此乃天下第一大忽悠。当年东来每学期只能与杨先生见一两次面，或是他去南开，或是利用杨先生来京开会的间歇。他平常主要靠书信往返，以函授形式向导师问学。杨先生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极其负责的导师，每函必复，循循善诱，并且精心制定必读书目，要求研究生写出高水准的读书报告。杨先生的言传身教，函授指导，严格的史学训练，对东来帮助很大，受益终生，懂得了怎样读书做学问，选择学术题目，查找考证史料，还有对学术的认真和专注，对功利的超脱和淡泊。

四、慷慨直言“大闹课堂”

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年是基础课和选修课。授课老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国际关系学院周纪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经济所卫林（世界政治），西欧所陈乐民（战后西欧对外政策），美国所张也白（美国外交）、张静怡（美国军事战略），等等。东来当时是高年级，忙于写论文，但抽空旁听了世界政治。

东来曾特别推荐资中筠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但她当时好像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此课由霍世亮先生代讲。众多基础课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陈乐民先生，中式灰色对襟衣，西式深色毛料裤，不知为何，裤腿短了一大截，有点儿像如今的“八分裤”。第一堂课，陈先生基本上跑题了，讲了一大通《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有康德《论永久和平》，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还有领导时尚新潮流的名士风度，令人难忘。

熟悉东来的人皆知，他是个谦谦君子，尊师重道，对学术界的前辈学者，尊重礼遇，推崇有加，感情深厚，没有丝毫狂傲自恋的陋习。但是，他偶尔也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叛逆一面，慷慨陈词，仗义直言，敢于“放炮”，而且炮火相当猛烈，丝毫不留情面。

大概是 1984 年秋季，世界政治与经济所的王书中研究员临时客串，主讲世界政治课程中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外交理论。毛泽东认为，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相互勾结，妄图称霸世界。中国以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想当年，虽然号称思想解放，但外交领域的禁区仍然很多。外交部出身的王先生未能免俗，讲课时照本宣科，认为“三个世界”战略理论高瞻远瞩，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

家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及其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没想到，在课堂讨论时，东来突然放炮，语惊四座。他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某一战略或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极不成熟，它把中共在国内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外交事务，事实上，战后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成熟而稳定，基本上不存在被中国“争取或联合”战略空间；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给钱就是爷，中国出头团结联合第三世界乌合之众对抗苏美两霸，纯属天方夜谭。

东来发表高见后，我和苏东所师弟姜毅、西欧所学弟钦鸣荣等同学，跟着起哄架秧子，纷纷表态，声援支持，一时把王先生惹得非常生气，大动肝火，厉声质问东来是哪个所的研究生？导师是谁？场面相当尴尬。卫林先生的徒弟、未来的大律师张晓武一言未发，坐卧不宁。好在王先生还算开明，课后没有上纲上线扣帽子，追究东来领头“大闹课堂”之事。我们在钦佩东来之余，多少也感觉他少年得志，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在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

五、采访郑洞国将军

东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皆以美援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题，不但深掘广拓，密针细线，大作文章，而且注意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使学术研究带有鲜活生动的特色。

某日聊天时，他听说原国民党驻印度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之孙郑建邦（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与我是同窗校友，便提出要采访郑洞国。建邦兄当时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执教，待人诚恳，非常热情，当即安排了采访，时间好像是1984年国庆节前后，地点在复兴门木樨地附近的“部长楼”。东来心细如丝，提前寄去了15个问题，以便郑将军有所准备。

非常可惜，因年代久远，当年东来都问了哪15个问题？郑将军又是如何答复的？我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郑将军对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评价不高，批评史氏尖酸刻薄，飞扬跋扈，“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完全控制中国驻印军，把营以上军官全部换成美国人。

采访之初，东来和我一口一个“蒋介石”，郑将军则言必称“蒋先生”，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只好也改口称“蒋先生”。郑将军回忆说，“蒋先生”与美方关系相当冷淡，而且与部队同甘共苦，对住房起居毫不讲究。开罗会议后，蒋与宋美龄赴印度兰姆迦训练营地视察中国驻印军，美方一再邀请他们下榻起居设施完善的总指挥部，但蒋氏坚持要住在新一军军部。郑将军只好临时腾出自己的简陋卧室。就这样，堂堂国家元首兼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夫妇，在相当于棚户区的军营里凑合住了几夜。

谈起戎马生涯，郑将军对 1939 年的昆仑关战役（广西宾阳县）情有独衷。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共产党有平型关，国民党有昆仑关！”此役国民党军以硬碰硬，喋血攻坚，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寇精锐之师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郑洞国时任国军唯一的装甲机械化军第 5 军副军长兼荣誉第 1 师师长，在昆仑关战役中居功甚伟。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90 年代中期后因《万历十五年》等大作而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家黄仁宇，居然曾是跟随郑洞国将军鞍前马后的上尉副官。

六、李慎之、资中筠和音乐爱好

东来虽然能侃善聊，但若碰见了美国所长、赵紫阳的对美外交顾问李慎之先生，则立刻就成了哑巴。东来回忆说，李慎之极渊博，广视野，擅言辞，大嗓门，一言堂，像训孙子一样教训研究生，从头到尾垄断谈话，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东来硕士毕业后，其实很想留在美国所，成为在职博士生。可是，当时李慎之好像并没把他看作什么少年才俊，几句话就把他打发到南开去了。那时美国所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瞩目一时的是张毅、温洋等公费留学归国的青年俊杰，还轮不到东来出风头。

多年后，东来在悼念文章中（《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了当年他与李慎之的交往，及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抱负理想，道德文章，叙述栩栩如生，刻画非常传神。我曾恭维东来说：“你悼念慎公的文章，绝对是悼亡之作中难得的佳品。”

东来是个读书人，但不是书呆子。他热爱生活，喜欢游玩，访古探幽，而且还是个“音乐爱好者”。有一次，我们去西城区绒线胡同“内部书店”购书，凭借社科院办公厅的介绍信，可以买到仅限副省级以上高干的禁书。从书店出来，路过刚开张不久的北京音乐厅。东来提议去听小提琴音乐会，郑小瑛前夫盛中国小提琴独奏，庄则栋前妻鲍蕙荞钢琴伴奏，把我听得昏昏欲睡，呵欠连声。东来不甘心，后来又向我隆重推荐过原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教授的自传《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不过，东来这个“音乐爱好者”是要打引号的。他五音不全，五线谱一个不识，钢琴不会弹，小提琴不会拉。由此，他特别钦佩前辈学者、美国问题和国际政治研究权威资中筠，称赞她国学根基深厚，英语法语俱佳，学术出类拔萃，在中美关系史领域造诣精深，而且钢琴水平极高，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文笔优雅，思想深刻，抨击时弊，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东来把丁则民、杨生茂、李慎之、资中筠列为影响自己学术与人生的“四大精神导师”。

东来五音不全的基因，不幸遗传给了女儿琬洁。好在琬洁 4 岁半开始学习钢琴，取得了十级证书，大学时代又苦练小提琴，努力实行“基因改良”。东来与女儿的第一次争吵呕气，也涉及音乐爱好。那时，琬洁 5 岁不到，学钢琴不久。父女俩嬉笑打闹时，琬洁故意踩了东

来一脚。东来不甘示弱，奉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拿起她的毛巾就擦。琬洁气得两眼通红，哭着质问老爸：“你会弹琴吗？你认识五线谱吗？”幼年的琬洁认为，这是她唯一比老爸强的地方。

七、遭遇同窗非议

想当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高手林立，群英荟萃。年轻人心高气盛，有些同窗对东来不太服气。一方面觉得他确实聪颖过人，在美国外交史领域学有所成，但也有些弱点，比如，学问有时流于夸夸其谈，国学根基比较肤浅，英文口语差强人意，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他只是能侃善聊，口才甚佳，把八分学识吹嘘成了十二分，人送绰号“任大摆忽”。

这些非议，有些是苛求。在文革动乱、斯文扫地环境中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在国学根基、英文水平、学问学识、理论素养、思想深度等方面，很难同时达到“超一流”水准，可能只有杨小凯是个例外。不过，对于当时青年学子最为热捧的书籍，比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萨谬尔逊《经济学》、萨特《存在与虚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贝克特《等待戈多》、钱钟书《管锥编》等，东来确实兴趣不大，涉猎不广。每逢同窗学友聊天讨论时，他往往插不上嘴。所以，遭遇非议，实属正常。

上述非议，我曾跟东来谈过，他未做正面回应，似乎并不在意。读书与治学与个人兴趣有关，看过几本深奥的名著，似懂非懂，云里雾中，未必真正代表理论兴趣或思想深度。哲学家可以凭借抽象推理，上下古今，深入探索；文学家可以凭借荒谬想象，横空出世，震聋发聩。而东来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史家之推理，史家之探索，必须有所根据，没有史料，寸步难行。史学大师傅斯年有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在史学领域，东来的研究相当扎实，努力挖掘中美两国史料文献和外交档案，两相比较，避免偏见。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1943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时，馆员却稀里糊涂地拿来了一大摞1946年“中美商约”的档案。他拿起来一看，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金银宝藏，双手开始发抖，原来这是中美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当年谈判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故记录全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没注意到重要性，让它一直安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落灰。东来惊喜不已，即使在档案收录相当完整的英文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这个谈判，只有存目，没有内容。这样，依靠扎实的原始文献，东来撰写了大作《试论1946年中美商约》，通过研究具体的谈判过程和双方的讨价还价，突破了以前把中美商约视为国民党政府“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

东来认为，“出色的历史研究，既能钻进去，还要能跳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有坚实的史料，争取穷尽所有的资料，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跳出来，就是如何从个案的研究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结论，这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联想”。

因脚踏实地，功夫扎实，东来尽管一度被视为“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但后来终于异军突起，在缺乏师承和科班训练的情况下，凭借个人兴趣，依靠史学根基，治学打通内外，跨越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美国宪政史、美国最高法院史，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反多数难题”、法官何以比民选官员更有权威、斯通大法官“脚注四”等理论性、思辨性较强的领域或课题中大显身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出版了很多学术杰作，注释繁复，论旨精当，卓有建树，影响很大，令人刮目相看。

八、关注莫干山会议

东来视野开阔，博学多才，广交天下豪杰，学贯外交内政，这一特色在硕士生时代就已初露端倪。

1984年9月我来北京读研后发现，东来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居然是9月3日到10日在莫干山（浙江省德清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我记得，当年东来最推崇的青年经济学家是“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最钦佩的研究生院学兄是财贸经济所的华生。他拉我参加过华生主持的莫干山会议吹风会，价格双轨制改革研讨会。他钦佩华生勤奋刻苦，知识渊博，目光敏锐，思路独特，志向远大，而且乒乓球水平出类拔萃。

莫干山会议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一群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汇聚于莫干山，挑灯夜辩之间，舌剑唇枪之际，关于价格双轨制、沿海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方案应运而生，雏形初备，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过，当年在同学之中，对莫干山会议的非议也很多，认为是“学术实用化，学问对策化，学者幕僚化”，有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且并未真正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全面探索，完全忽视了政治改革问题，是中青年政治、法律学者的一次“集体失语”。当年与我同寝室的日本经济专业学兄刘大洪（刘宾雁之子）一再强调：“这帮奏折经济学家真是太天真了，没有政治改革配合，价格双轨制、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最终必然会造成难以预料、极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多年以后，东来对我一再谈起刘大洪的真知灼见，称赞其观察问题的眼力和角度。但是，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80年代中期有条件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吗？很难说。

东来是个正人君子，数十年来，谈话聊天，从来都是围绕读书治学，极少涉及家长里短。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儿八卦佐料。2007年某日，在一次电话中，东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华生这哥们儿本事高强，不减当年，把中国作协的美女主席铁凝娶回家当了媳妇。

九、调研报告彻底“砸锅”

在外交政策领域，80年代初期，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远见卓识，上书中央高层，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已经趋向缓和，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等提法已不妥当，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反苏划线的对外政策极需调整。他们还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立论缺乏根据，不成其为“理论”。此后，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已经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从未正式向下传达过，故学术界仍然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宦乡后来出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长，临时办公地点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招待所。世界历史所学兄吴恩远（后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毕业后在中心任职，成为宦乡的助手和智囊。1985年春，他冷不丁把东来和我召去，说是要不拘一格，启用新人，让我们参加“80年代后半期的国际战略形势”调研报告的写作，东来负责中美关系，我负责中苏关系。我们两个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满口答应了。

为了让我们开阔眼界，启发灵感，恩远兄还拿来了一摞我驻苏驻美使馆外交官、武官发回国内电报的复本，把最新情报和外事动态做了一番介绍和通报。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们辜负了恩远兄的信赖，调研报告彻底写“砸锅”了。我们的“战略预测”谨小慎微，寥有创意，预料在“可以预料的将来”，1945年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将基本维持。可是，做梦都没想到，80年代末期风云变幻，地覆天翻，戈尔巴乔夫访华轰动全球，“六四”事件震惊中外，中美关系急剧逆转，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阵营烟消云散，苏联帝国土崩瓦解。转瞬之间，雅尔塔格局竟然沦为历史的残垣断壁。这些天崩地裂般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竟然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丢人可真是丢到家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世事人心，波诡云谲，错综复杂，难以预料。仰望星空，纵观历史，人类对自身局限、人性弱点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及其复杂程度与相互关系的认识，其实相当有限。

十、南开法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成了俩口子

1985年秋，东来赴南开读博，我去送行。谈起读书，他推荐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我说，此书大学时代看过，印象平平，此公专门跟钱复先生唱对台戏。接着，东来又推荐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我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当时从未听说过此书。

东来说，此书绝对是经典，极负盛名，在史学界小圈子引起很大轰动，属于必读书，但已经脱销，你恐怕很难买到。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已经收拾好的行箧，翻检出一本如今很罕见、很珍贵的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万历十五年》，随手送给了我，然后潇洒地挥手告别。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

东来1988年在南开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国史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水平有多高？我是个外行，说话不算数。美国史专家杨玉圣教授认为，该书“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自成一家之言，迄今仍是代表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的一部优秀之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求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美国史专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东来拿到博士后，决定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执教。不久，他来京开会，顺便探望我。他那时新婚燕尔，满面幸福，夫人吴耘是南开旅游管理系的美女研究生，本科念英文专业，英语、法语俱佳，两人相识于南开的法语课堂。想当年，东来面对美女，闹暗恋，单相思，上课难以集中精力，法语学得一塌糊涂，成绩一度一落千丈。他想表达爱意却羞于开口，最后好像是请出同窗好友“做媒”，俩人终成眷属。

东来得了媳妇还卖乖，愣装傻，他告诉我：“真奇怪了，南开法语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学生居然成了俩口子。”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20年之后，我与东来的女儿琬洁在华盛顿市一家日本小餐馆吃面条。我随口问了她一句：“听说你老爸的法语水平非常差劲？”琬洁真不愧是东来的好闺女。她回答：“我爸的法语其实相当不错，发音尤其标准。当然，肯定不如我妈。”我顿时无语。

十一、初次合作没有成果

2000年前，东来的治学兴趣主要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但对冷战史、中苏关系和中共党史也非常感兴趣。他最钦佩的当代史学家是沈志华、杨奎松、高华等人，还有旅美学学者陈兼教授。

1990年春，东来给我寄来英文版《中国季刊》刊登的旅美学学者郝雨凡、翟志海《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对历史的再考察》一文。此文甚佳，但其中有些问题，尚有探讨和商榷之处。于是，东来和我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不约而同，突然对中国参加韩战的决策过程产生了兴趣，打算携手合作，从各种中、英、俄文资料文献中，试图弄清楚周恩来1950年10月赴苏与斯大林讨论中国出兵参战与苏联空军出动的关系，弄清楚周恩来此行是否带着参战或不参战的两套方案等高层决策内幕。

因东来建议，我两次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俄语翻译、原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原

苏东所顾问师哲，他恰好跟郑洞国将军住在同一栋楼。经师哲引荐，我还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机要秘书、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少将。可是，由于缺少完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我们除了弄清楚周恩来的行程外，其它问题全是一锅粥。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研究，除了留下一堆认真讨论的信件外，并没有任何学术成果发表。

这一困扰东西方冷战史学者的“世界性难题”，直到 1993-1994 年期间俄罗斯方面公开秘密档案，直到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学兄沈志华一系列基于解密档案的非凡大作问世，才最终水落石出。

十二、义正词严的民间“外事交涉”

1990 年 12 月，我负笈西渡，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留学深造。没过多久，1992 年初夏，中美关系低潮之时，东来随资中筠、袁明、章百家等赴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再次聚首，不胜感慨。

东来一行下榻之处，距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不远，遂慕名前去参观。当来到“海湾战争”临时展厅时，东来心细眼尖，发现在陈列展出的缴自伊拉克军队的各型武器装备中，最醒目者，竟然是一门标明“中国制造”的四管高射炮。

东来当即勃然大怒，向主办方抗议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苏、法、美制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苏制“飞毛腿导弹”（scud missile）和 T80 型主战坦克，中国援伊的武器装备微不足道。可是，你们把标明“中国制造”的高射炮赫然陈列在展厅最显眼处，给全体参观者以中国是伊拉克军事后盾的强烈暗示，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

这一番民间“外事交涉”，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把美方工作人员“教训”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说起来，美方还真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场表示：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请留下正式书面意见，以供研究改进。

东来的答复令人叫绝，说：我行色匆匆，缺纸少笔，而且不知道“飞毛腿导弹”的准确英文拼写，这么着吧，由我口授，你们记录，然后由我签名，并请将文字记录稿转呈你们的上司，以免石沉大海、渺无音讯。美方工作人员点头称是，详细笔录，执礼甚恭。

数月后，我因事路过美国历史博物馆，本想进去看看，美方是否已经接受了东来的批评，把高射炮撤下去了。但那时“海湾战争”临时展览已经收摊，“中国制造”的高射炮亦去向不明。

东来是全面、立体、深入研究美国的学者，堪称“美国通”。他常年在大洋彼岸游历访学，出任访问学者，很容易被贴上“亲美派”的标签。其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

美两国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永远都是东来做人和做学问的起点和终点。

十三、“三重校友”和“双重校友”

1991年底，苏联分崩离析。此后，美国各大财团和基金会大幅度减少了对苏联问题研究的资助，前景一片黯淡。恰在此时，信息技术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前景一片光明。我这等俗人，当即决定放弃学术，改学电脑，读了个信息技术专业的理工科硕士学位，后来混成了“资深电脑软件工程师”。

1994年，东来再次来到华盛顿，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中苏问题研究所两家合作的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出任研究员兼客座教授，在中苏问题研究所拥有一个设施齐全的办公室，与曾经指导过我的美国教授比邻而居。这样，茫茫人海之中，从长春到北京到华盛顿，命运让东来与我的人生轨道不断交集相汇，一不留神居然成为“三重校友”。

那时，我正忙于毕业实习和找工作，偶尔去东来的教授办公室坐坐，讨口茶喝。有一天，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我大发感慨：“好惊险呀，幸亏哥们儿及时改行了，要不然，如今会出现‘任东来是陈伟的导师’的场面，太尴尬了。”东来笑呵呵地说：“以前人家说我‘指导’过杨生茂先生，现在顺便指导一下陈伟，那还不就是举手之劳。”

1999年秋到2000年春，东来第三次来到华盛顿地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夫人吴耘和女儿琬洁同行，住在华盛顿近郊。恰好在此前后，因我换工作和搬家，我们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

2000年秋，东来与我恢复联系后，才发现我们当时近在咫尺，相距约一公里。琬洁（1991年生）和我女儿陈晨（1988年生）还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晨竟然无意中为琬洁当过一次英语翻译。

那时琬洁刚来美国，一句英文不懂，作数学作业时，像国内一样，把答案直接写在了教科书上。老师解释和比划半天，她就是不明白。老师只好请来高年级的陈晨，用中文向琬洁解释说，不要把答案直接写在书上，因为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科书归学校所有，要传给下届学生，以节省教育经费。

非常有趣的是，陈晨2006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琬洁于201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为法律博士（J.D.）研究生。两家的孩子居然成为“双重校友”。

十四、“美国所考生的素质不高”

东来逝世后，因在杭州筹办缅怀老师的读书会活动，他的博士生张庆熠采访过我一次，问起一些当年东来与我交往的陈年旧事。他特别关心的是：任老师2000年前后，从中美关系

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突然转到美国宪政史和美国最高法院史，其转换学术方向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作为最早的合作者，您和任老师是怎样开始着手从事美国宪政史和美国最高法院史研究的？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和理念？

我的答复可能令人失望，东来转换学术方向，以及我们最初的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法律票友”对宪政法治领域的好奇和求知欲，有那么一点儿“个人探险”的味道，而非课题先行，事先就有了成熟明确的整体想法。至于转换的具体过程，则更为复杂，决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若论缘由，恐怕要追溯到1982年美国所的美国政治试题。

当年东来报考美国所，要考英语、政治、世界史、美国史和美国政治五门课。前四门他都学过，最头疼的是美国政治，基本上没有参考书，全靠自己瞎琢磨。美国政治试题中，有十个只给出了英文的名词解释，难倒了一大片考生。幸亏在丁则民先生的指导下，东来研读过几本美国原版书，故除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之外，其余的名词都给答出来了。

82级研究生入学后，有一次，李慎之突然举出托克维尔的例子，批评美国所考生的素质不高、知识面过窄，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法国贵族思想家是何方神圣。对东来触动很大。

商务印书馆1988年推出托克维尔的传世名作《论美国民主》后，东来花费了很大功夫，反复研读，而且对《联邦党人文集》也非常重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个特点，即都不是纯理论的概念推演，文笔通俗易懂，对权力本质、人性弱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洞察，注重分权制衡的艺术，同时没有仅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思想感情和民俗民情的独特视角，很对东来的路子。

1994年东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冷战史项目的研究。期间，他能够跳出浩如烟海的外交档案和史料，开始像托克维尔一样，深入社会，四处游历，从外交联想到内政，思考更为深层次的宪政法治问题。

十五、冷战结局与“烧国旗案”

当年东来和我有一个巨大的困惑，像苏联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国力强大、不可一世的大帝国，为何会突然一下子分崩离析、自我解体。

关于苏联在冷战中崩溃的原因，学术界曾流行过一种“二杆子”理论。一个是“笔杆子”，即认为苏联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巨额金钱，控制、掌握和引导各种媒体和舆论，恶毒攻击、抹黑丑化、进而全盘否定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和占据执政党地位的苏共历史，最终导致苏共人心丧尽，臭名远扬。另一个是“枪杆子”，即认为苏共放松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在历史关键时刻，苏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最终导致天下变色。

可是，依照这种“二杆子”理论，在冷战中首先崩溃垮掉的国家，绝对应当是美国，无